



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学术著作

美国战后中国学

王建平 曾 华 著



NEUPRESS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学术著作

美国战后中国学

王建平 曾 华 著

东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 沈 阳 •

© 王建平 曾华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战后中国学 / 王建平, 曾华著. —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81054-950-2

I. 美… II. ①王…②曾… III. 汉学—研究—美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755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110004

电话: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真: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neuph @ neupress.com

http: // www. neupress. com

印 刷 者: 沈阳市政二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25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3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责任编辑: 李毓兴

责任校对: 于 琴

封面设计: 唐敏智

责任出版: 杨华宁

定 价: 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美国的中国学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于 70 年代、兴盛于 80 年代、繁荣于 90 年代。其间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交互影响贯穿始终，对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 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教育和美中关系的讨论。70 年代标志着东亚研究的细分化，学者的目的性更强、更明确，参与设立全国性组织，致力于推广、普及东亚文化的公共教育、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80 年代中国学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与学科化得以深化，而这一进程却是以东亚学学者从公共事业和政策部门的淡出为代价。90 年代的主要特征是学科专业化和国际合作。本文力求勾勒美国中国学 40 年的发展脉络，对阶段性研究成果做出评述，最后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及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学者的借鉴做出评估。

《Post-WWII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Chines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in the post-WWII year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developed in the 1970s, boomed and flourishe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present study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East Asia, China in particular, maps out the context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mutual intellectual perceptions over the four decades. The final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and substantial situational report on the academic resources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y have evolve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and an evaluation of various phases of this development in its major fields.

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n understanding of U. S. - Asian relations in general,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study of 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 S. attempts to answer some crucial specific questions such as: How far have academic imag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been influenced by official views in Washington and vice versa? What influence did scholars such as John King Fairbank have on this process? To what extent ha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been influenced by U. S. governmental policies? Did the academic enterprise launched by U. S. scholars serve to dampen cold war animosities or promote them? What kind of knowledge about China has America needed? Has China scholarship functioned as an impediment to imperialism or a subtle expression of it? Scholars' career reflects forces and emotions that arise in the lives of most Westerners who have faced the hazards of making sense of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 and interpreting them to an audience at home.

Research on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ceived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 this country,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on Post-WWII perio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studies in particular, have remained unbalanced without a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Western and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hina. This book includes a substantial study of major scholars, texts, and policy analysis and history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I hope, to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s now flourishing in this country and a rich research source for scholars and students.

序

中国学，亦称“汉学”、“中国研究”，国外关于中国的研究的统称。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等各部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为创建时期，在各国传教士中产生了最早的中国学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为发展时期，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无所不包的中国学，逐渐分解为一些相对独立的分支，并出现了大批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出现，并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和作用日益增强，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较之以前又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其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

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带有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子，同时又区别于传统汉学，它呈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政治色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不可忽略的因素。不了解中国现政策和政治走向、不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美国的政治家就无法与中国打交道。尽管美国学者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时间并不长，从事古典汉学研究的学者不多，学术声望逊色于欧洲学者，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逐步向以“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为特征的东亚研究转变。由于他们拥有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雄厚的研究经费、先进的研究手段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因而使他们的中国研究在西方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区域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隶属东亚地区研究。这种研究从研究目的到研究内容和手段都与欧洲古典汉学研究存在根本区别。美国的中国研究奠基者们从一开始就把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美国的公众。

本书力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资源做出评估，从影响汉学的动机和方法开始，探讨战后该领域在美国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院所的机构设置、国家级研究所、中心的分布情况、奖学金和研

究基金的分配情况、科研项目资助情况、海外培训基地的设施建设、学科发展问题等。在冷战后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美国的中国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涉及到当代国际关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我们希望通过对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做一系统考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关系的文化内涵，以超越对中美关系研究的肤浅认识，取得深层的理解。

在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术史和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把战后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史放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环境之下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教授对本书提出了中肯意见，特别强调了要把对美国中国学的考察置于中美关系史乃至整个战后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中。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影响超出两国乃至亚太地区，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关系一度处于不正常状态。中美建交后，尽管有着一些波澜起伏，但中美关系基本上沿着健康轨道发展。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中美两国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无论是政府、学术界、企业界、文化界、基金会团体和个人，都经历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震荡，从冷战时期向冷战后时期的过渡，而中美两国的相互观察和研究探索也承载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中国学的历史考察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一历史考察也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任务，它包括对美国方方面面的中国学家的研究、美国学者们研究模式的变化、美国政府和机构对中国研究项目的资助和政策调整、美国各大学中国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建设、大学中国学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美国各大基金会作用和影响、美国中国学学术界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之间的关系等。

应当指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对美国政府亚洲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功过是非也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总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有着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学者和广泛的话题。笔者希望能对中国学在美国的发展脉络做出冷静的、客观的描述，对美国中国学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及现状做出评判，以及在 21 世纪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笔者将着重评述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发生、发展、变化；
2. 中国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状况；
3. 美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群体和职业队伍状况；
4. 中国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情况；
5. 中国学学术资源分布；
6. 美国学者的研究模式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借鉴；
7. 中国学面临的问题；

笔者将着重从这七个方面展开，每一个大的方面还包括众多细节问题。我们期望对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的相关学科、学术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予以综合评估。这些研究证明，中国方面的情况都对美国研究中国社会、人文、经济、政治、对外政策所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开放使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利用，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更加方便，从而对学者产生正面的影响，加强和丰富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因此，每门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研究对象的一个侧面，而这些侧面最终又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走向合流。

比如，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是西方由汉学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型学者。这种过渡实质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美國全球战略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研究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新动向。而围绕着费正清的“官学模式”所展开的学术与国际政治之激烈辩论也应从这个框架下给予评价。

费正清代表了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时期。他所倡导的“冲击反应论”（Impact-Response）代表了中国研究的一个侧面：中国近代史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军事等对中国冲击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开始有所转变，开始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来研究中国。其代表人物是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Paul A. Cohen）。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的观点。^①中国学者汪熙指出，因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时，应同时注意到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即使植根于中国本身所发展的历史事物，也必然会向外辐射并承受外国对这种辐射所做出的反应；而西方冲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才能显露出来。“研究国际关系史总会碰到双边和多边的复杂矛盾，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当事国的双边关系这一对矛盾。”^②即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但要研究中国，还要研究美国；不但要研究中国

^① 参见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

^② 汪熙：《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主编前言，孔华润著，张静尔译，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对美国的反应，还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不但要研究这些互为作用的反应，还要研究这些反应通过各自国家内部因素而起的作用及其连锁反应。只有把握一个事物的矛盾双方及其运动的全过程，才能对一个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

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现代东亚学的开拓者。费正清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东亚研究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东亚学在美国的学科化和机构化进程又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费正清在哈佛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重新认识、全面考察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对新世纪中美关系研究有重大意义。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费正清执教哈佛大学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主线，考察中国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以及费正清和他所在的哈佛大学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学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学术上，费正清的研究模式乃至研究成果为各国学者所效仿。鉴于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在国外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和其所处年代，费正清研究对于 21 世纪中美关系乃至中美文化关系史的战略走向具有特殊意义。

机构化与学科化是美国中国学区别于传统汉学的一大特点。许多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美国中国学家的名字都与机构紧密相联。他们帮助建立的有关中美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机构、团体、刊物、媒介及其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太平洋学会），为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信息服务。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界、各大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莱特基金会等），大力资助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为学者们提供研究经费，赞助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同时，机构研究还是观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映美国政府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作为学术、文化和外交的职能部门，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区别欧洲传统汉学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主要标志。这种为帝国主义需要而产生的研究对科学研究产生制约。考察这些机构的历史和现状至关重要。

费正清等老一代学者不仅学问深厚，而且长于学术组织，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于 1954 年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 年任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席。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美国东亚研究，而且扶持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东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他做了大量学术普及工作，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由 12 个国家的 100 多位中国学专家撰稿，

这部巨著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准。

1941年，费正清成为东亚学者中的核心人物。1940年后，费正清对美国已开设或准备开设东亚课程的大学进行访问。他向美国教育部提出在美国中、小学开设亚洲文化课程的设想。费正清的一系列力度非凡的学术举措卓有成效。1941年6月，太平洋战争尚未开始，费正清就已经对东亚地区日益加剧的危机做出了预测：

“美国面临在亚洲的抉择。美国人民对亚洲尚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制定一套对日本和中国的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民主的理念应当建立在对人民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愚昧无知以及在亚洲政策上的失败必将导致民主的失败。时下加强远东领域教育正迫在眉睫，然而减少招生量和冻结大学教育经费则无异于釜底抽薪。这是该领域的学者们必须面对的巨大危机与挑战。”^①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费正清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费正清指出：“美国对东亚的研究具有战略意义，不仅仅出于学术方面的原因，还因为远东直接关系美国 and 全球的稳定与安全。”因此，东亚研究是美国藉以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费正清的呼吁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得到了认同和响应。时值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呼声更具紧迫感。在其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费正清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发起了关于东亚的讨论。他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系列以美中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为题的演讲，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费正清的远见卓识和连贯严谨的学术思想贯穿于文章和讲话中。在这些论述中不乏深邃精辟之见，也流露出他的历史观。从另一个方面，费正清的主张也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71

类似费正清这样的奠基型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科研项目。我们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记录中国学在美国的发展、变迁和现状，并指出当代中国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及学术界的动向。笔者将对这些学者的政治观点和缺陷给予评价。诚然，美国战后的中国研究发源于紧张的国际政治背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整个冷战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这些都对中国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此期间，中国学学者的不懈努力克服了中美关系进程中的种种困难。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前夕，约翰·林白教授（John Lindbeck）考察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对冷战、对美国学术界研究新中国的状况深感焦虑。他认为，孤立主义导致无知和沟通的困难。遗憾的是，尽管他本人曾致力于中美两国学术界的沟通和理解，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林白教授没有能够看到1971~1972年后中美关系所产生的新时期戏剧性的变化，也没有目睹1979年后中美建交后广泛学术交流的开展。自从林白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美国汉学评价以来中国研究在美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该领域70~80年代的发展和成熟，是一批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林白（John Lindbeck），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鲍大可（A. Doak Barnett），施瓦尔兹（Benjamin Schwarz），艾克斯坦（Alexandra Eckstein），斯加勒皮诺（Robert Scalapino），李维斯（John Levis），韦廷（Allen S. Whiting），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等。他们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环境十分敌视“共产党中国”的环境下致力于建立当代中国研究项目。许多后来的学者都是这些先行者的弟子，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倡导的学术思想。

美国学者特别重视研究模式。研究模式的变化也是考察美国“中国学”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研究模式与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战后中国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模式的更替，反映了学术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美国的中国研究也走过了美国种族中心论和过分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模式。美国学者的研究有时比较盲从，缺乏主见，而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总的来看，研究模式的交替变化为中国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学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历史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研究模式也将推陈出新，学者的研究途径也更加广泛和深入。

美国的中国学在21世纪面临新的问题，但总的来看，我们仍可以对新世纪美国汉学的研究前景持乐观态度，这是由中美关系的交往和中美关系的发展

趋势决定的。新世纪伊始，美国学界开始关注更广泛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研究。这些努力的直接结果是，随着美国汉学研究进入其发展的第5个十年，该领域已经进入健康、繁荣的轨道。这说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共识与合作（学者个人与机构）已经初见成效，加之有来自公共和私人企业的源源不断的资金，中国学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中国学在新学科、新领域和新方法的探索上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对许多美国学者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又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但至少它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深不可测、遥不可及，学者们也不再只是隔岸观火或雾里看花，而是开始有那么一点儿洞悉烛微了。

中国学的发展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的健康发展和壮大，机构化、学科化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学科化与机构化又离不开基金的支撑。基金问题总是起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只要资金短缺，机构不健全、学科发展不平衡就在所难免。在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些阶段受制于资金匮乏。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其经济、军事和地理位置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美国人不会无视这些因素。出于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学必将是一个众所瞩目的资助领域。这将为我国学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本书得以出版，离不开许多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们的指点和启示，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教授、辽宁大学范岳教授、沈阳师范大学范格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博士给予的关怀和指点，还要感谢东北大学科技处和东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感谢东北大学出版社李毓兴编审为本书的成书所做的大量细致、耐心和详尽的编辑审校工作。

本书自成稿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些问题的分析和总结一定会存在分歧，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在此敬请学术同仁指正。

作者

200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战后的中国研究:历史的考察	1
1.1 中国学的历史成因	1
1.2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的中国文化研究	4
1.3 西方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研究	5
1.4 美国的汉学传统	6
第二章 美国战后中国学的初级阶段	9
2.1 美国现代中国学	9
2.2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	10
2.3 发展的十年	11
2.4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研究学术团体	11
2.5 语言培训与区域研究	14
第三章 中国研究的学科化与机构化	16
3.1 科研院所、学科建设、科研项目	16
3.2 中国学领域学术资源分布	18
3.2.1 奖学金制度	18
3.2.2 海外培训设施	19
3.2.3 科研设备及图书资源	20
3.2.4 研究基金	22
3.2.5 中国研究的外部基金	23
3.2.6 福特基金会资助情况:1952~1969 年	24
3.2.7 1959~1969 年主要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学	25
3.2.8 外部资金的使用情况	26
3.3 中国学:问题与前景	28
3.4 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	29
第四章 费正清与美国的东亚研究	33
4.1 学术生涯	34
4.2 学术争议	34
4.3 费正清在哈佛	36

4.4 中国经历.....	38
第五章 美国战后中国学:40 年回顾	49
5.1 20 世纪 60 年代	50
5.2 20 世纪 70 年代	54
5.3 20 世纪 80 年代	56
5.4 20 世纪 90 年代	60
第六章 中国政治研究	62
6.1 1978 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62
6.2 1978 年以后的趋势研究	64
6.3 机构主义研究模式	66
6.4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67
6.5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69
6.6 政治学研究模式	71
第七章 中国学专家学者	73
7.1 异军突起的新派学者	74
7.2 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	75
7.3 中国学的合理化	80
7.4 中国学的发展途径	81
第八章 美国的汉语语言教育	84
8.1 学生数量	84
8.2 教师培训	85
8.3 教材使用	86
8.4 课程设置	87
8.5 生源特点	88
8.6 评价标准	89
8.7 目标及实现途径	92
8.8 教学手段和资源	95
8.9 文化底蕴	98
8.10 汉语教学的原动力	99
第九章 中国学的方法论问题	103
9.1 思想史研究	103
9.2 社会政治史研究	111
9.3 经济史研究	112
9.4 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模式	113

9.5 现代化模式	113
9.6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模式	115
9.7 《汉学的忧虑》	117
9.8 中国政治文化	119
9.9 1966~1978 年美国政治学的中国观	124
第十章 中国学的发展前景	128
10.1 研究重点与背景	128
10.2 国家与社会关系	133
10.3 国际关系	134
10.4 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学术团体	135
10.5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136
10.6 文化多元化	136
10.7 资金问题	139
10.8 观念与机遇	139
10.9 体制与税制	140
10.10 医药与公众健康	142
后 记	144
参考文献	145

第一章 美国战后的中国研究： 历史的考察

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林白（John M. H. Lindbeck）教授出版了他为福特基金会撰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报告，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现代“中国学”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林白教授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发展的十年”。林白教授的此项研究对中国的研究领域做了详尽的阐述，搜集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学”领域的组织机构分布情况、学者和学生的数量、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发展历史、该领域的资助状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等都做了调查。作者还对未来“中国学”领域的持续发展做了分析和评估。

1.1 中国学的历史成因

林白教授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当时美国的学术群体。福特基金会在资助该领域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仅在1959年和1970年间，福特基金会就通过奖学金、拨款2300万美元赞助美国和国际上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除了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投资外，美国政府也提供了大约1500万美元的资金，主要为学生、学者提供奖学金。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也提供了大致相同数量的资金支持该领域的发展。1969年，鉴于福特基金会多年来对该领域的支持，福特基金会决定聘请一位“中国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和问题做一项全面、系统的研究。林白教授承担了此项研究任务。

作为学者，林白教授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发展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他的学术活动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和尊敬。林白教授出生在中国大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造诣深厚。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继续

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随后在耶鲁大学任教，在政府机关工作数年后，于1958年又回到大学执教。从1958年到1971年去世，林白教授致力于中国研究领域的组织、计划和发展。他本人在这“发展的十年”里起着重要作用，并努力使他对中国的研究客观化。

林白教授主要在美国的两所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1959~1967年，他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67年以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林白教授在他有生之年对“中国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组织和领导了多项国内外研究项目和学术机构建设，其中包括：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该机构隶属于美国学者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SSRC]），他本人曾担任该研究会主席（1964~1970）；中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美国学者联谊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赞助，从1968年起，林白教授一直担任该学会主席；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联络委员会（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全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National Committee of American-China Relations）。

在从事研究过程中，林白教授充分利用自己渊博的学术知识和丰富的学术经历，并在国内、亚洲和欧洲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讲学。1970年开始，他开始撰写《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形诸文字。在书中，他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源和状况做了全面的评估。但遗憾的是，林白教授没有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的著作，于1971年1月病故，离中美关系正常化仅仅相隔数月。林白教授原计划撰写国外和美国国内“中国学”的学术成果及公共资源。在他临终前，他没有能够完成国外部分。

《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一书从影响“中国学”的动机和方法开始，探讨20世纪60年代该领域在美国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院所的机构设置，国家级研究所、中心的分布情况、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的分配、科研项目资助、海外培训基地的设施建设。

林白教授特别提出过去和未来的学科发展问题。林白教授在书中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此书是该领域里在这一时期最有价值、最重要的研究报告。在谈到“中国学”未来的发展时，林白教授预见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领域的发展将遇到一系列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的问题和挑战。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确保新一代学者和研究机构有机会得以施展才华，设立新的研究课题和项目，扩大对中国的了